



惰性实践、物的指令与物化的社会场域——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研究

仰海峰

2009-07-17

【内容摘要】惰性实践与物化问题，是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讨论中，萨特进一步发挥了自卢卡奇的物化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并从微观视角揭示了个体生存的物化处境、人的实践何以反转为惰性实践的条件。物的指令使人在生产层面成为工具，在社会关系中成为孤立的个体存在，这是物化社会性场域的特征。只有借助于个体生存的体验以及群众的实践，才能在总体化的辩证理性中超越惰性实践，实现个体的自由发展。

【关键词】匮乏 惰性实践 物的指令 系列 集体

在国内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相比而言，对萨特的研究较为薄弱。在现有的萨特研究成果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萨特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所做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①，而对于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即惰性实践（inert praxis）与物的指令问题，缺少分析。从萨特的总体理论规划中可以看出，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着手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异化”的物质力量及这种力量对人的生存的影响；一是个体的创造性实践所带来的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第一个问题，他以惰性实践为核心来揭示物的指令体系以及这一体系对个体生存的决定性影响，在我看来，这是萨特在这本著作中思想最为深刻的部分。惰性实践使人的创造性力量逆转为制约人的惰性力量，成为历史中的消极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具有一种可怕的、令人沮丧的含义：它似乎表明使人统一的力量是一种有魔力的惰性否定，这种否定夺走了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劳动，通过根除人的本质，使劳动作为惰性的行为和总体来反对一切人。”^②由匮乏引起的实践反而成为人的自由生存的障碍，这正是人类实践的内在困境。理解这一部分内容，不仅是理解萨特思想的重要维度，对于我们理解个体的生存处境以及历史的否定性力量，也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一、 匮乏与历史的构成

萨特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同匮乏作斗争的历史。匮乏构成了既定社会条件下物质性消极行动的原初结构，这种原初结构通过人传递到物，又通过物回到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匮乏关系体现出不同的历史规定性。虽然在表面上，匮乏体现的是一种物质存在状态，但实际上，匮乏体现了一种非常根本的、普遍的人类关系，这就像马克思在讨论资本时所指出的，虽然资本在表面上体现为一种物的关系，但实际上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正因为匮乏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初始结构，个体的自由实践的结果会逆转为外在的惰性物质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匮乏是一种必然性，匮乏关系构成了辩证实践的一般外部条件。作为外部条件，匮乏就不只是一种自然物质关系，它包括了人创造的社会环境，体现了社会环境中人的活动条件的匮乏。虽然自然意义上的匮乏构成了人类实践的前提，但社会意义上的匮乏更是萨特讨论的重点。

匮乏体现了具有多元复合特性的实践同周围的物质的己定关系的物化状态，它既是人类实践的惰性前提，又是人类实践产生的惰性结果。作为人类自由实践的初始结构，匮乏是人类历史的可能性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由于生产方式和习俗的限制，产生了社会。当一种生产模式在内部建立起一种均衡结构时，这个社会就会稳定地存在下去。历史产生于失衡，有失衡才会破坏许多社会层次，使稳定的社会走向变化。因此，匮乏指的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使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产生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的结构变迁。萨特的分析具有海德格尔的特征：一方面，人总是处于环境与关系场域之中，个人的存在并不体现为孤立的个人，而是寓于实践场域之中，匮乏在这个实践场域中具有否定性的功能，它通过物质力量而产生否定作用；另一方面，人类实践会再次否定这种否定性的消极力量，达到个人与物质环境的总体化。

匮乏是一种惰性力量，它使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非人、物化的关系，个体与自身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个人的实践过程会因为匮乏而生产出惰性实践关系，每个人的活动通过社会环境转而反对他，成为具有他人特征的力量。通过物质的社会化和对作为惰性统一体的物质的实践否定，个体并没有直接成为自由的个体，而是被建构为他人。个体的存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人的人，体现为一种异化的种类，正是匮乏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状态，“他人即是地狱”，早年萨特的这句名言似乎再次以变形的方式体现出来：“匮乏使每个人的纯粹存在处于持续的非存在的危险中，这种危险不仅针对另一个人而且针对每一个人。更为恰当地说，这种持续的湮灭自我和湮灭每一个人的危险，已不仅存在于我所见到的他者身上。我自己就是那种危险，我就是那个他人，是被环境的物质实在性设定为对他人而言的潜在的剩余。这涉及到我的存在的一种客观结构，因为对他人而言，我的确是一个危险者，通过这种否定的总体性，我对自身也是一个危险者，因为我是那个总体性的一部分。”^③这是个体的双重分离状态：一方面与他人处于分离之中，另一方面与自己也处于分离之中，正是匮乏造就了人的这种非人性的惰性结构，人的实践将外在的否定内在化为自身的结构，这是社会异化的深层存在方式。不仅个人的存在方式受匮乏制约，现代社会和工业化进程也是如此。“把工业化看作在过去匮乏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也许更合理、更容易理解，这种匮乏是历史（就其表现为制度和实践的而言）的一个真实因素，它建立在通过他人用物对人进行否定的基础上。”^④正是匮乏造就了物质惰性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通过对个人的作用，经过个人实践使个人成为匮乏的人，使个人处于一种外在的总体性之中，而不能完全实现相互性关系的总体化。在匮乏的作用下，实践相互性转变为反人性的，使人根本上就是他人，使人类关系成为抽象的物质关系，社会伦理成为惰性社会环境的伦理，因为在人成为非人时，人就只能在恶之中感知到表现为他人的社会结构。这使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危险，相互性的关系被打破了。匮乏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当冲突发生时，敌对者们互相试图摧毁的不是简单的匮乏威胁，而是实践本身，因为实践不再体现为对人的自由的肯定，而体现为对人的背叛，使人变成非人，在这个意义上，暴力与反暴力都成为匮乏情势下的人的行为，也是匮乏社会的结构性行为。“在匮乏的语境中，暴力应该被界定为具有摩尼教倾向的人类行为结构。暴力总是使自己显示为反暴力，显示为反对他人暴力的一种报复。”^⑤在萨特看来，匮乏理论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他认为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既定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情境中，劳动既是一种历史的现实性，也是对特殊工具の利用，劳动是各种社会关系组织的基础。”^⑥但在劳动过程中，匮乏的内在化使物质力量变成为一种否定力量，导致社会关系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匮乏是对历史辩证法内在机制的补充说明，这表明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双重的实践否定过程，即在社会组织之中对物质的否定行动和对行动的物质否定之间的辩证运动和辩证关系。虽然匮乏所导致的惰性实践可能毁灭人的存在与自由的普遍性，但作为人类历史的基础，匮乏及其惰性实践结构又为个体永恒的可能性提供了前提。个体及其群体对匮乏的反应，使人的属人关系可以跳出匮乏结构之外，并使环境物变成个体总体化结构的构成要素，实现对惰性力量的逆转。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辩证过程，也是我们在后面要讨论的话题。

二、惰性实践与物的指令

根据萨特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三个层面讨论匮乏：一是作为初始的物质资源的匮乏，意指人类生存物质条件的不足。二是在这种初始匮乏下的实践所形成的社会物质条件的匮乏。初始意义上的物质资源的匮乏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通过人类实践变成了社会性意义上的匮乏。例如在今天，我们在物质上的匮乏相比于早

期社会来说，就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匮乏。三是人与人关系的匮乏，这是人与人关系的物化，这种物化导致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物化，弱化甚至消弱了人的自由创造能力。萨特关注的焦点在后两种匮乏上，也就是人类的实践物化领域和人的物化领域，这是对人类实践异化的进一步分析。

实践具有物质惰性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实践是在特定的物质环境中进行的，实践首先在于将物质实在工具化，这是以物质惰性为中介的实践，以此为基础的统一体只是实践的消极反映。在人类劳动的初期，实践的物质性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通过实践将自己铭刻进自然环境之中，并向整个大自然延伸，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劳动陶冶自然”^⑦，人对自然的改造反过来也会形成支配人的力量，人化的自然会变成新的威胁，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也会在自己的周围促生出一个反合目的性的场域（a field of counter [CD*3]finality）。在这种情境中，人类的实践造成了情势的逆转，合目的性的力量逆转为惰性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颠倒为人类实践的目的。但另一方面，这种消极实践是以人为基础的构成性实践，它体现出超越单纯物质惰性的内容，并且更新了原初的物质惰性含义。对于这个过程，萨特这样进行了描述：“在这种逆溯与前进的双重层面上，我们发现了真正的辩证法的一种新结构：每一种实践都是一个整体，是对所揭示的物的超越，这种实践体现在物质性中，并作为对先前早已物质化的行动的一种意指性超越。一切物都通过预先虚构的意义的消极统一而制约着人类实践。每一种物都通过人的中介而相互沟通；每一个人都诞生于一个人化的物质现实和物质化的制度的世界，在这一历史运动的中心，他们都看不到为他们显示的一般未来。”^⑧这是惰性实践对人的消极制约。

在惰性实践中，人作为中介体现为两种存在形式：一是存在于沟通性的、预谋的、综合的实践中。在这一中介形式中，物是按照自然主义的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的，这是从物本身中产生出物的观念，这种观念把可看见的和可触及的物质仅仅看作是工具，把物理客体的自然属性确定为物质的可用性的根源。比如重商主义者将黄金看作是财富的惟一规定，就体现了这种物的观念。在这种实践中，个人与集体并不是一致的，在重商主义的物质实践中，对于特定的某个商人来说，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也无论价格如何波动，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当他得到了额外的一千金币时，他就更富有了。一是处于系列性中。处于惰性实践中的同一个或不同的人，在实践目的性的边缘将自身构成为与共同实践有关的他人，活动中的群体的综合内在性被个体的相互外在性所取代，这一点造成了他们的物质性分离。这就像早年马克思在批判市民社会时所指出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⑨。系列性的关系也是如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支配下的个体所形成的总体，只是一个惰性的、从外部调节的巨大体系。当大众缺乏政治联系时，大众也就物质化了，当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被物化之后，物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意义，它把共同命运强加给一些互不了解的人，同时通过这些孤立个体加强了个体之间的分离，社会的物化本质就是这样发生的。“物化的本质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将个人变为物，而是社会结构将一种必然性强加到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上，这些成员从属于这个群体，并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总体，看作是一个分子结构。……他的对象化是由他人的对象化的惰性力量从外部来改变的。”^⑩这是一种机械性的联系，而不是内在的相互关系。萨特的这一论述，将马克思关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的主题微观化了。

按照“存在先于本质”的思路，人首先是他自己，这是人的存在，作为后天的本质是历史的形成的，本质的异化也只能在后天的行动中发生，人们的自由产生了奴役，我们在自由的选择之中走向了物化世界。在物化的世界中，客体的消极统一性构成了个体自由实践的先在条件。个体或群体的实践总想通过计划来改变这个物化世界，使世界朝着总体化发展，但如果这种实践按照物化世界的律令来行动时，它便将自身遗忘于物化的伪总体之中，成为人的存在的纯粹的否定，这就是一种惰性实践，这种实践使人处于物质惰性之中，成为被既定物控制的人，这是人类世界的真实历史的特定结构规定。受既定物控制的人是“处于需要、实践和匮乏状态的人”，需要、实践和匮乏构成了人的内在规定。就需要而言，在其本真的意义上来自于人自身，但在受物控制的情境中，需要是由既定物从外部引起的，是客体把人指定为人的行为所期待的那个人。在特定的实践场域中，外在的统一构成了个人存在的先在条件。如在机器生产时代，人们只是在特定的环节隶属于机器总体，人们对机器发出的指令实际上是由机器系统预先规定的，劳动者成为机器-主体的客体，劳动者群体被机器生产线分离于各个环节中，他们只有通过机器的流水线才能构成一个总体。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是由惰性物质发出的指令（exigency），惰性物质通过简单的结构说出了需要所想要的东西，劳动

者的期待是由机器规定的，人成为机器的候者，人的需要最终变成了一组机器对人的指令。需要是他者的指令，他者并不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而是一个自组织的机器，机器的命令通过既定物发生于人，并将自己就表现为人的规定性。当实践变成了惰性物的要求时，创造性的实践被颠倒为惰性的实践，需要存在于惰性实践的惰性期待之中，在这种期待中，劳动者成为他者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或材料，而他者的需要又会成为另外一些他者的期待，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惰性物质体系，人的内在性与相互性被以物为中介的伪相互性关系替代了。萨特以机器体系为例讨论现代人的存在方式，他这里的“物”与“他者”就具有机器体系的意谓。“通过物，作为他者的人在肯定他对人的优越性。这样，机器要求被保持在正常的运转状态，人对物的实践关系成为他对机器的要求的回答。”[11]通过机器体系，萨特描绘出一个物体系的王国，人只是这个王国的命令的回应者。这个思想后来构成了鲍德里亚论述消费社会中物体系与需要的理论基础。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体系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图式，并通过广告的中介作用生产出人们的“需要”和“欲望”，那个在消费社会中貌似的主体，说到底是由物体系建构出来的。在鲍德里亚的后期思想中，物体的报复将构成这个世界的宿命。[12]存在于经济的、技术的和社会复合中的物，并不是单一的存在，物本身构成了系列性的指令结构，这种指令通过惰性实践表现出来。虽然实践的惟一目的是生命的无限再生产，但任何实践都是处于物体系中的实践，在物化了的实践中，物的要求就会展示为一种绝对指令。就个人而言，在每个人所属的他人的环境中，物的指令就是绝对命令，在个体身上凝聚了作为强制的权力，个体成为实现他者的指令的中介。“物的指令不管是由一个机器一人还是由人类的机器提出来，都通过人作用于机器，正如它通过机器作用于人一样。无论是在作为迫切的期待和权力的机器中，还是在作为（在给定的惰性秩序中的）模仿者、行动者和强制者的人中，物的指令总是在一种不可分离的共生中把人作为实际的代理人，同时又把物作为被加工的产品。”[13]因此，在这种指令下，人与机器处于共生关系中：一方面人的活动支持变性，支持异化的力量；另一方面，这种变性，这种惰性力量又回过头来制约着人的活动。个体的实践就是把物的指令内在化，并力图将这种物化的力量置于自由的实践场域之中，但个体的实践却正好回应了惰性物的指令，即物通过受他所支配的人说出物自身的要求。萨特认为，物的这种要求，就是所谓的客观矛盾。这种矛盾的深层结构是一定社会场域中人类群体之间的对立，在行动—惰性的意义上，矛盾就是在总体中发展起来的反合目的性，即在一个实践中体现为合目的性的东西，在另一个实践往往会变成反合目的性的东西，专家在面对噪音时所做的技术改变就是这类矛盾。这种改变正是对惰性物的指令的回应。这是物体指令的第一种表现形式。

物的指令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存在于利益中，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指令。利益是特定社会场域中人同物的关系，它以所有权为最初的依据。对他人而言，利益是对物的占有关系，利益的根本特征就是在物的世界中否定人类之物，即将人类的所有物变成个人或特定团体的所有物，人使自己物化以便为占有物服务。在这样的结构中，个体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被物所控制的他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孤立化的个体存在方式，个体处于在自身之外的存在的系列变性结构之中，这时普遍性利益就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幻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并不是先验的发生作用，利益是生产方式划分人们的结果，它体现的是实践惰性场域中人与物之间的占有关系，每个人都按照利益原则行事，这就意味着“特殊利益的一般特征就在于，它永远不可能变成普遍利益，也永远不会作为特殊利益而稳定地得到实现”[14]。萨特的这个论述说明了如下的问题：在利益关系中，物的指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只是这一指令的执行人，这才是利益关系的本质。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利益史观，而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观，如果是前者，那么利益就是一种先验的存在状态，这正是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在解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的基本原则。

物体指令的第三种形式体现在“命运”中。萨特结合工业化进程认为，机器对工人来说就是一种命运，因为机器通过一种时间的和目的论的过程，把工人变成为一架开动机器的机器，这时人与机器的关系发生了颠倒，机器是绝对指令的发布者，人变成了绝对指令的执行人，是机器完成自己指令的工具。在机器指令的作用下，人的实践不再具有创造性，而是成为惰性场域的推动力。萨特关于机器与人的关系的论述，比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更为微观，这也表明萨特对机器的哲学理解是颇为深入的。

对工人而言，机器是一种命运，这种命运决定了工人的存在方式。工人作为群体，在机器中是以否定的方式被联系起来的，阶级在直接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惰性存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阶级”概念。在卢卡奇的讨论中，阶级体现了一种主动的、总体性的意识，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形成这种阶级意识。但在萨特这

里，阶级不再是一个具有主动意识的群体，阶级存在的“根源在于物质性的消极综合。这种综合既是社会活动的一般条件，也是我们最直接、最天然的客观实在”[15]。在物质性的综合中，个体的本质是过去的、已被完成的存在，个体创造性的实践在车床或机床传递的运动中被物化了，在由物的组织所形成的阶级关系中，阶级变成了惰性实践的物化要素。萨特认为，当阶级形成时，物的作用反而模糊了。一方面，人们在机器中看到是过去劳动者的影子，另一方面，人们又从机器的使用中看到了另外一个阶级，是这一阶级利用机器来增加他们的利润。当阶级斗争出现时，人们关注的就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看到这两个阶级都只是惰性力量作用下的产物，如果阶级斗争只是反对资本家而没有改变资本的存在，这种斗争所取得的自由说到底还是虚假的自由。因此，真正存在的不是资本家的自由，而是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的自由。真正的阶级斗争必须指向资本，需要改变的是资本的结构，这种资本结构在今天就体现为机器化的物化体系。这种物化体系不仅作用于我们的当下生活，而且在未来等着我们。因此，工人反抗机器，在直接意义上是在改变自己的命运。这里又出现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初期反抗资本中出现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机器只是资本的物化表现形式，如果把破坏机器作为斗争的根本目的，没有看到资本才是机器背后的本质，而资本的本质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所有的对抗都是在表象层面进行的。但如果按照卢卡奇以来的思路，即异化不只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而是发生于生产力层面，特别是沿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那么对机器的反抗又恰恰是最为根本的。对于资本来说，机器的体系化也意味着这个阶级是在一种外在性中达到自身的统一的，这表明机器体系对资本家而言也是一种外在的惰性体系，所以萨特说：“作为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的‘资本’总体，也像命运一样控制着每个人。”[16]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当工人阶级不能从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时，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但在机器体系化的时代，社会化是在别处完成的，因为资本总体在它的社会物质性中否定工人阶级所希望尝试的实践的总体化（即社会化），并通过自己整个的惰性实践存在来肯定资本所有者的否定性的扩散。资本构成了惰性实践中人的根本命运，工人阶级的反抗针对的就是这一命运。

三、系列与集合体：物化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

在物化的惰性实践场域中，个体体现为孤立化的单元存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聚在一起、但又互不相干的多元外在关系，即个体体现为系列（series）与集合体（collectives）中的存在，比如公共汽车站中的个人就是这种惰性集合体中的存在。在现代社会，尤其在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集合体样态成为个体生活的主要方式，孤独（isolation）也成为个体挥之不去的感受，这也是惰性实践所造就的结果。“作为一个暂时的和偶然的聚集中成员们之间的外在性关系，孤独的程度体现了社会整体的大众化程度，因为它是在既定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个层次上，作为相互性的否定，相互的隔离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一体化，在这个意义上，孤独可以被看作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是被发展的总体所制约的生活）……这是对所有内在性的外在否定，正如‘谁也不帮谁，人人为自己’所表达的一样……就像等车时的个人一样，这个城市就是惰性实践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存在着一种走向个人互换性、工具性整体的互换性运动；自早晨开始，大城市就作为指令、工具性、氛围等而存在。”[17]孤独成为个体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也是集合体中人的存在方式。作为集合体，人们根据一种工具性的关系、一种孤独的和互不相干的外在性关系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外在的相互性关系。

但这并不是说在集合体中，人们的行为是杂乱无章的，相反，系列的顺序性与相异性是抽象同一的集合体的构成方式。在等公共汽车时，人们是按照先后顺序上车的，这是现代社会中的秩序量化规定。如果汽车能坐10人时，那么10个人都能在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如果只能坐9人时，第10人就只能等待下一辆车，这是物体对人的分离，即匮乏与实践的惰性结构制约着系列关系。系列的差异是由物所规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本质性的差异，而是惰性实践领域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能形成集合体的抽象同一性。萨特的这个分析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使在抽象的同一性之中，被物所中介的个体也不是完全同一的，而是系列性中的差异物。系列中的个体的相异性，使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关系，个体不是抽象的“这个”，而是系列中的“这个”，系列中的个体依赖于他人，个体总是生活在别处。“作为同一性的统一体的相异性，总是存在于别处（elsewhere）。在别处只有一个他者，这个他者总是不同于自己。”[18]系列的法则

是集合体得以形成的法则。

在相异性的作用下，集合体中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在场与不在场的状态。说在场，是因为在集合体中，通过物的中介人们直接聚集在一起，比如排队打饭的学生，说不在场，是因为聚集在一起的个体并不能建立一种真正的内在相互性关系，形成共同实践，这是一种在场中的分离状态，以保证成员之间的相异性联系。其实集合中人的这种不在场状态还可以发生在空间不同的成员之间，比如收听同一电台的听众就是如此。萨特称这种集合为惰性的集合。处于惰性集合中的个体，无法改变这种他人的规定性，这是一种联系之中的无能性的表现，但这种无能为力感正是系列得以存在的粘合剂。“我在他者中感到我的无能为力，因为作为他者的他者将决定我的行为是个体的创造性活动，还是疯狂的举动并把我扔回到抽象的孤独之中……”[19]虽然系列性的存在形成了一种多元复合性的集合体，具有总体性的特征，但这种总体是他者的总体，与一种肯定的和具体的总体，与真正的总体有着根本的差异。这种物化的总体，就是社会化在当下历史的存在方式。

从萨特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惰性实践构成了一个完全物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消除了人在行动中所具有的否定能力：一是个体行动对物化世界的否定能力，一是群体行动对系列和集合体的否定能力。个人的自由实践消失于无机性和外在性的惰性实践之中，并被既定物所控制，使个人实践的客观化变成了客体的生产，人变成了受他者规定的“他者”。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自由实践的变异是因为实践的主体不再是自由的个体，而是他者或者物，正是人的行动自由造成了对总体化意义上的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在物的中介作用下才能完成。在这个变异的过程中，萨特认为反倒揭示了辩证法的重要规定：“实践的辩证法的唯一实在，就是个体的行动是一切事物的动力。”[20]个体以及由此形成的群体的实践构成了走出惰性实践的出路。个体的行动一方面作为破坏力量打破物化的结构，反对机器体系所强加于自身的命运，另一方面个体的行动以辩证统一的名义重新回到生命与实践之中，把社会组织建构为具体的总体性、作为控制生产资料和总体生产的总体性。只有这时，工人才能从惰性实践中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说，萨特坚持一种先验的个人自由的观念。萨特反倒认为，人都是从奴隶走向自由的，现有的物化体系是走向自由的物质前提，即使在物化的全面化时刻，仍然具有解放的可能性，因为实践物化的同时，也有着对这种物化的理解。在对物化的超越中，个体的生存体验、群体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实践推动着社会与个体的总体化，有助于辩证经验的建构，借助于辩证经验，个体才能真正地超越惰性实践。

注释：

① 在中译本的《辩证理性批判》中，这一文本是作为方法论置于第一部分，参阅[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Jean - 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 Smith, NLB, London, 1976. p. 123.

③ Ibid., p. 130.

④ Ibid., p. 155.

⑤ Ibid., p. 133.

⑥ Ibid., p. 152, note. 35.

⑦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0页。

⑧ Jean - 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p. 169.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73页。

⑩ Jean - 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p. 176.

[11] Ibid., p. 188.

[12] 参阅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第二章。

[13] Jean - 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p. 191.

[14] Ibid., p. 206.

- [15] Ibid., p. 232.
[16] Ibid., p. 215.
[17] Ibid., p. 257.
[18] Ibid., p. 267.
[19] Ibid., p. 277.
[20] Ibid., p. 322.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网络编辑：胡毅）

[上一条](#)

[下一条](#)

从伦理到政治的建构主义——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思想逻辑基础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